

档案与北京史

国际学术讨论会

论

文

集

上

北京市档案馆
编

INTERNATIONAL ACADEMIC

SYMPOSIUM ON ARCHIVES

AND BEIJING HISTORY

中国档案出版社

档案与北京史 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市档案馆 编

(上册)

中国档案出版社

责任编辑/詹红旗

封面设计/刘守卫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市档案馆编. —北京: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3.7

ISBN 7-80166-169-9

I. 档… II. 北… III. 北京市—地方史—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K29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7480 号

DANGAN YU BEIJING SHI

GUOJI XUESHU TAOLUN HUI LUNWEN JI

出版/中国档案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1 号)

发行/中国档案出版社

印刷/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850×1168 1/32 印张/39 字数/979 千字

版次/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500 册

定价/160 元

编委会名单

主 任：徐俊德

副主任：黄 仪

委 员：吴家林

张小莉

陈荣光

马素萍

罗运鹤

吴建雍

李建平

梅 佳

陈立新

刘 苏

桂玉兰

李松龄

总编审：王国华

编 审：俞玉储

刘邦烈

刘 苏

编者说明

一、本书为1999年“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选集。这次会议于8月16—19日在北京召开，有海内外120多位档案界和史学界专家学者出席。会议由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档案学会主办，由中国史学会、北京历史学会、北京史研究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10个单位和团体联合发起。会议收到论文及报告117篇，现选收95篇编入文集。

二、本书将报告排在论文之前，论文大致按史料、政治、经济、城市建设、教育文化、社会民俗、宗教与中西文化交流7个部分进行编排，每部分又按文章内容所涉及的时间先后顺序进行编排。

三、本书所收论文，大部分经过作者修改或编者的修改、删节。一般均删去了插图和附图，有的文章因篇幅过长，删节较大，不当之处，还望作者、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档案工作与历史研究——在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

- 论会开幕式上的发言……………戴逸(1)
- 北京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曹子西(5)
- 北京史研究在海外……………史明正(11)
- 加强馆藏研究 充分发挥档案价值——北京市档案馆
馆藏档案的整理与利用……………方旭(29)

- 开发档案资源 为北京近代史研究服务……………王国华(36)
- 开辟北京地方文献新史源……………来新夏(41)
- 北京地方文献与地方档案……………韩朴(46)
- 日本东洋文库所藏《镶红旗档》述略……〔日本〕细谷良夫(60)
- 清代北京珍档述评——析一史馆藏清代京师档案……陈锵仪(71)
- 清代北京地区历史档案的整理和利用……………唐益年(114)
- 步军统领衙门及其档案……………俞玉储(122)
- 清代与民国时期北京地区审判活动档案资料综述…沈珂(136)
- 北洋政府大理院及其档案评介……………陆军(149)
- 首都博物馆藏契约文书概述……………刘谨桂(159)
- 地图与档案……………李孝聪(170)
- 近现代时期若干北京古旧地图研究与
数字化处理……………王均等(183)

- 嘉道年间的京城保甲制度与社会治安……………王开玺(194)

评北京市档案馆藏两卷宗档案与近代史的

- 有关问题 马金科 (203)
- 1912 年 8 月孙中山访问北京的心态 朱宗震 (210)
- 孙中山第二次北京之行 张同新 (226)
- 民国初年北京陆(海)军军界团体 陈长河 (248)
- 民国北京(北平)政治文化地位刍议 李铁虎 (263)
- 满铁在北京的侵略活动管窥 杨韶明 (273)
- 北京警务学堂、高等巡警学堂与
- 川岛浪速 [日本] 中见立夫 (283)
- 京都市政公所的演变与督办的变化 孙洪权 (291)
- 民国时期北平历任市长及有关问题 刘 苏 (300)
- 1928 年起北京(北平)名称变更时间 孙洪权 赵家鼎 (308)
- 天津商会与 1931 年河北省产销税抗争 [香港] 张志东 (314)
- 关于华北驻屯军档案和资料 [日本] 安井三吉 (329)
- 卢沟桥事变研究中的档案问题 曲家源 (340)
- 从日本驻北京使领馆档看 1945 年前日本驻北京
- 特务、宪兵及宗教等机构 房建昌 (355)
- “文革”组织报刊档案与当代北京史研究 陈东林 (386)
- 邮政在北京的兴起与发展(1866—1949) 蒋 耘 (401)
- 略论民初的京钞风潮及北京政府对京钞的整理 于 彤 (414)
-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北京的华资银行 司马城 (439)
- 民国时期北京不动产物权公示制度的形成及特点 丁世华 (449)
- 建国五十年来北京市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 沈立邦 (457)
- 对“一五”时期北京市经济工作的回顾与思考 郭晓燕 (465)
- 北京制药工业的公私合营 钱椿涛 (479)

祖国首都建设和发展的基址——十五世纪的

- 北京城 劳允兴 (485)
- 清末民初北京城市空间演变之解读 史明正 (493)
- 试论影响近代北京城市转型的因素 郑 忠 朱庆葆 (502)
- 近代北京与沿海口岸城市经济发展比较 陈勇勤 (516)
- 北京建都与近代天津经济的发展 蓝长沅 (537)
- 京津城市关系发展探略 任云兰 (551)
- 北京近代市政工程之一大举措——1915 年改造
- 正阳门瓮城和展修京都环城铁路 张复合 (563)
- 宋哲元与北平市政建设 李全中 (573)
- 何思源与北平的城市建设及管理 吴家林 徐香花 (583)
- 国际化进程中的北京历史文化名城
- 保护与发展 方 可 章 岩 (599)
- 周恩来与北京的城市建设 曾令勋 (610)
- 新中国首都建设规划的初创 (1949—1955) 董志凯 (617)
- 对首都 50 年来城市改造建设的反思 张 量 (629)
- 北京城垣的保护与拆除 申予荣 王 勇 (634)
- 简论什刹海历史文物保护区的环境与街巷的
- 相互关系 徐秀珊 (641)
- 北京郊区小城镇建设的规划和所取得的经验 况树生 (654)

档案工作与历史研究

——在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开幕式上的发言

戴 逸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贵宾们：

档案与北京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今天隆重开幕了。有海内外 120 位专家参加会议，这确实是一次规模很大、规格很高的学术盛会。请允许我向来自国外的许多专家学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向全体与会者表示崇高的敬意，也向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档案学会等 10 个主办单位和发起单位表示崇高的敬意。感谢他们精心的筹备，使我们有了一次聚会、交流、讨论的机会。大会组织委员会要我做一个发言，谈档案与历史研究的关系，这是个老题目了，谈不出什么新的意见，只能是老生常谈。在座的许多同志都是档案专家、历史学家，我在这里只是班门弄斧，说一点粗浅的感想，有不妥之处大家指正。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也是一个历史著作非常丰富的国家。同时档案也像中国历史一样，像中国历史著作一样悠久、丰富。20 世纪一百年以来，中国古代档案陆续被发现，其品种、数量、其重要性可以说是惊人的，引起了全世界学术界的强烈反应。

20 世纪发现的档案极为丰富。中国古代的档案大概有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河南安阳殷墟的甲骨。发现了三四千年前殷商

的档案库，上世纪末开始出土。当时农民把它当成药材卖，叫做龙骨，实际是乌龟的背跟牛骨头，上面刻的古代文字，记录着殷商进行战争、祭祀、狩猎等活动。20世纪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数量达15万片，很丰富。这是我们三四千年前的档案。这样一个远古的档案库的发现，使得中国殷商史的研究改变了面貌，建立了甲骨学，产生了像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李济这样一大批专家，这是第一个时期的档案；第二时期的档案是战国、秦汉、三国时期简牍的发现，木简、竹简，20世纪以来陆续出土，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以来发现了很多。像居延汉简、湖北的竹简、湖南马王堆的竹简、郭店楚墓，湖南发现了很多三国时代的竹简。最近二三十年发现的简牍、帛书非常多。竹简一部分是书籍，大部分是当时的文书档案，数量巨大，距今大概二千年上下，从战国到秦汉，三国时期。这些发现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二三十年以来考古史上的重大事件，填补了战国、秦汉、三国时期的历史空白，由此产生了简牍学，使得我们对上古时期的研究面貌一新；第三个时期的古代档案是敦煌、吐鲁番文书和古代碑文。也是在上世纪末，跟甲骨文出土差不多时候发现了敦煌的藏经洞，藏经洞里的经卷、文书，后来又发现吐鲁番的文书，时代是从南北朝、隋唐和北宋，一千几百年前的事情。这是中古时代的文书档案。这些文书档案现在分散在海外各国。另外，又发现了许多碑刻资料，许多墓志铭。这些资料大大地推动了南北朝、唐宋时期的研究，产生了敦煌学、金石学；第四个时期古代档案，是清朝灭亡以后宫廷中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为世人所知。特别是清代的档案，清朝中央机构将近三百年，军机处、内阁、内务府，这些中枢机构的档案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些档案的整理出版，大大地促进了明清史、近代史的研究，也促进了历史档案学的建立。

此外，还有地方档案，像四川巴县的档案，安徽徽州和各地方的契约、文书，沈阳的满文老档，还有海关的档案，以及个人的档

案，如曾国藩的档案，李鸿章的档案，盛宣怀的档案、端方的档案。还有少数民族档案，像西藏的档案，数量极大，时间跨度很大，这样一个大的宝库，现在还不清楚究竟藏的是什么东西。所以中国的档案资料之丰富是惊人的。20 世纪对中国来说，是古代档案大发现的时期，是档案学大发展、大丰收的时期，大大推动了历史研究，推动了甲骨学、简牍学、金石学、敦煌学、历史档案学等新学科的建立。可以说 20 世纪的历史研究跟档案的发现与利用密不可分，20 世纪历史学的辉煌成绩是建立在古代档案的发现和利用基础上的。我们这一代学者非常幸运，得天独厚，有非常好的研究材料，能够看到许多前人看不到的珍贵资料，扩大了我们的眼界。档案是原始资料，历史研究必须依靠原始资料，没有原始资料就像鱼没有水，鸟没有空气，历史研究就不可能进行。历史科学的殿堂必须是以史料作奠基石。自古以来，大学者、大思想家、历史学家都和档案密不可分。我们知道中国最早的知名学者老子本人是东周的柱下史，是管理图书档案的；孔子编《六经》，就是古代文书档案之汇编；司马迁也是管理图书档案的，根据档案创作了《史记》；班固全家都是管理图书档案的，他本人就是兰台令。中国古代根据大量的历史档案，才产生了实录、通考、会要、方略等到各种历史书籍。古代历史学家跟档案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近代许多历史学家，根据档案写出了许多优秀的著作和文章。王国维利用甲骨文写了《殷周制度论》、《殷先公先王考》等著名论文；郭沫若利用甲骨文、金文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成为 20 世纪的学术大师。另一位史学家邓拓，收集整理了几百年前北京门头沟煤窑的档案、契约，写了著名的文章《从万历到乾隆》，对当时煤矿的组织、经营、发展水平作了深入研究，成为档案研究和历史研究结合的典范。由此可见，古往今来的历史学家都和档案结下了不解之缘。档案史料对历史研究具有重大价值，这是档案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档案是第一手材料，是历史正在进行中形成的文件，是当事人亲身经

历和直接记录的，不是追忆，也不是道听途说的传闻。这种直接性保证了档案记载的真实性。另外，档案数量非常大，内容丰富，事无巨细，都有所反映。一史馆有一千多万卷（件）档案，七十个全宗，涵盖了三百年的历史，确实是汗牛充栋，浩如烟海。我们发现的甲骨文有 15 万片，发现的竹简多得不得了，档案中包含有巨大信息量。档案还有系统性特点。档案是处理事务时形成的文件，不是片段的、零碎的记载，而是对历史过程、全过程的记录。自始至终，原原本本，有头有尾，反映了全过程。比如太平天国档案，从金田起义开始，一直到太平天国失败的 14 年，每一次战争都有详细的记录。你要有时间读完太平天国的档案，你就对这场农民战争一清二楚，了如指掌。档案的直接性、丰富性、系统性，决定了档案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历史学家把档案看作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历史学家和档案学家有着密切的天然的联系。建国以来，档案工作者积极参与史学研究，出版刊物，发表论文，召开研讨会。像这次研讨会就是史学工作者和档案工作者联合召开的。我希望档案工作者和历史工作者能够保持这种传统的联系，发扬这样的传统。长期以来，史学工作者一直享受着档案工作者辛勤劳动的成果，一直感激档案工作者默默无闻的奉献。史学工作的繁荣进步离不开档案工作者的支持。我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深深感谢全体档案工作者的努力，并且衷心祝愿中国档案事业和历史科学携手前进，共同繁荣。

北京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曹子西

北京的历史十分悠久，历代流传下来的北京文献资料也相当丰富。姑且不论北京成为全国首都之后，至今仍保存了大量有关北京的京师档册、皇家实录、图经志谱和个人著述，即使清廷日益衰败，由朝廷还延聘方志学家缪荃孙等人，编撰了一部计 130 卷，达 350 余万字的《光绪顺天府志》。尽管此书亦有不少缺陷和错失，但却汇集、编纂了比较翔实、完整而又丰富的资料。当我们回顾近百余年来北京史研究的时候，不能不首先想到光绪十二年（1886）完成的这部关于北京地区的大型志书。它是中国封建皇朝官修的最后一部专门记载京师首府的志书，又是留给 20 世纪最早的一部研究北京历史的必备参考资料书。

20 世纪的前半期，北京这座城市经历了世界列强的入侵、北洋军阀的混战、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和沦陷时期日伪政权的压榨。在这种险恶、动荡的环境中，一些对北京的传统文化和风俗民俗怀有浓厚感情和兴趣的史志学者，收集整理、编辑出版了不少记述北京史迹的书籍。如：瞿宣颖编，北京广业书社 1925 年印行的《北京历史风土丛书》第 5 辑 5 种，以及他自己编撰，1934 年由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印行的《北平史表长编》，就是较早出现的几种。张次溪自 20 年代始即网罗文献，整理北京梨园史料，开拓北京风土民俗研究，坚持四十余年不辍，先后完成有关北京史的撰述达百余种。又如：1936 年印行的许道龄编《北平庙宇通检》，1937 年印行的李家瑞编《北平风俗类征》，等等，也都是至今仍具

有参考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北京史重要工具书。

在这个时期，比较完整而又系统的北京志书，主要是1938年至1939年由史志学家吴廷燮、夏仁虎等编纂的《北京市志稿》。这虽是一部未定稿，但内容丰富，排列有序，原稿近二百卷。当时北平已经沦陷，它的编纂者们利用了日伪政权企图粉饰太平和笼络史志名流而肯于拨款一万余元作为经费，历时一年即纂成了初稿。这部志稿广泛搜集了前代文献资料，保存了大量民国时期史料，尤其是从官方调集的档案材料，为其他同类文献所无法比拟。然而，此稿遭遇坎坷，流离转徙，沉于仓底，竟达一个甲子始得以同读者见面。近年来，在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支持下，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组织复审、点校，整理成为157卷，约400余万字，分装15册的一部大型志书。应当说，这是继《光绪顺天府志》将近半个世纪之后，又一部关于北京史志的具有标志性的重要成果。

综观20世纪前半期，除了北京史料的发掘整理、风土民俗的撰述，以及北京市志的编纂成果比较显著，这些北京史志研究的先行者还来不及进一步探求北京历史演变进程中的诸多问题。当时，在中国历史领域讨论的学术问题中，对北京地区也曾有所涉及。譬如，周初燕国始封地的问题，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即曾有过长时间的讨论，可是由于史料和考古材料的不足，在那时也不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这个问题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京郊房山区琉璃河西周遗址陆续发掘后，从出土的多件青铜器铭文中得到证实，才有了最后结论：这里就是周初燕国的始封地。

运用唯物史观和现代科学方法，对北京历史地理进行规律性的认识和剖析，可以说是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关于北京自然环境的实地考察和理论研究开始的。他对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主持编绘了《北京历史地图集》，还写出了普及读物《北京史话》。北京大学师生最初写于1958年的《北京史》专著，1985年修订后出版，最近又出增订本，

则成为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作指导，分析研究史料，简明扼要、系统记述北京历史的先声和首创。自 50 年代以来，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北京史研究领域十分活跃，学术成果累累，先后出版的关于北京史方面的各种著述，达千种以上。其中包括：专史、专著、文集、论丛、图册、资料，以及全书、丛书、辞书、年鉴、手册，等等。在这些著述和报刊发表的文章中，几乎涉及到北京历史发展各个时段上的主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无论研究、讨论的深度还是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

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同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在北京地区的许多重大考古文物的新发现和档案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公布是分不开的。应当说，这些新发现的重大考古文物和档案文献资料极大地推动了北京史研究，突破了北京史研究领域中的不少难点和疑点。比如说，1929 年在京郊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发现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及体骨化石，就把北京地区早期人类活动的历史推前了六七十万年。又比如，1962 年以来对房山琉璃河西周古城遗址与墓葬的发掘，从发现的多件珍贵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已经证实，这里就是周初燕国的始封地；从而解决了北京建城确立城市行政建制的时间，即为文献中记载的周武王灭商封召公奭于燕的年代。这样，也就明确地解决了北京建城确立城市行政建制，迄今已逾三千余年。秦汉、隋唐以来北京地区大量地下文物的出土，如：宣武区的多座陶井和古瓦井群、丰台区大葆台汉墓的“梓宫、便房、黄肠题凑”、西晋华芳墓志及骨尺、云居寺石刻经板、金中都城水关、元大都和义门瓮城箭楼遗迹，以及明清档册的整理和近现代革命文物的收集，等等，都对研究不同历史时段的北京城建、政治、经济、文教和社会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北京史研究广泛、深入的展开，主要是随着近 50 年来北京市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逐步发展起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在北京市两个文明建设中日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首先是建立了专门

的研究、编写组织和机构，其次是逐步形成了一支相当庞大的专家和业余北京史爱好者相结合的队伍。即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为例来看，“文革”之前北京市并没有专门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1978年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正式成立了市社科院，下设历史研究所，其主要任务就是聚集人才，整理史料，研究编撰北京史。他们于1980年编出了60余万字的《北京史大事记》，经加工整理和精选，于1984年出版了一部《北京历史纪年》。同时，一面收集文献史料，一面从事专题研究，陆续完成了约五六百万字的资料摘录和选编，作为《北京史研究资料丛书》已出版6种。在此基础上，他们于1988年前后，写出一部40余万字的《北京历史纲要》和进一步编撰《北京通史》10卷本的三级框架目录，并邀请各方面专家作为学术顾问进行了审读和提出意见。在这个过程中，市社科院的北京史学者由个人或集体还先后完成和出版了20余种论文集与专著。最后，于1994年才出版了这部数达320余万字的10卷本《北京通史》。迄今为止，在同类北京史著述中，这部通史是容纳史料最多，反映前人和各方研究成果更为充分，并具有自己独创性的一部学术专著，也是力求系统地、全面地、完整地论述北京地区所经历的约70万年的人类发展史，3000多年的城市史和一千余年的建都史的一部大型专著。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在全市进行的一件大规模文化工程是《北京志》的编纂。这是由北京市政府直接领导以及各区县、各系统行政部门参加的编志工作，专职人员上千，兼职人员上万。《北京志》分编35卷，100多册和18个区县的“区县志”，预计全部完稿后，将达到一亿字左右。现在多已编出初稿，在今后三五年内即可陆续出版。可以预期，这将是矗立在新世纪之初的关于北京地方志建设的又一座丰碑。

展望21世纪，在北京新编地方志这座坚实的资料基础上，北京史研究工作定将发展得更迅速、更广泛和更深入。历史规律性的

东西将取得更深层次的剖析和认识。北京史的研究成果将同北京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践结合得更加密切。

一、在 21 世纪，北京市将全面完成旧城的改造，并在新的经济机制的前提下，不断发展作为首都城市和当代国际大都会的各项建设工作。适应这种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北京史研究工作首先应当在两个方面作进一步地发掘和探索，一方面是北京历史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元、明、清成为全国首都以来的北京文化史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北京城市从封建皇家堡垒向近代、现代城市演变进程的研究。从目前情况来看，在这两个方面虽有若干专题研究论文发表，但还没有形成更具学术权威性的著述。同时我们也相信，对北京历史发展各个重大时段上疑而未决的争论问题的进一步研讨，以及各个方面在专门史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定会产生代表 21 世纪学术水平的北京史著作。

二、转变学风。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文革”以来，我国学术界长时间内受到“左”的思想影响，北京史研究领域也不例外。这种状况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可是，由于 10 年“文革”的荒废，老一代的学者忙于撰著自己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年轻一代的学子大多又是在没有完全打好中等基础教育的情况下，跨进了专业研究的领域，从而产生一种急躁、浮泛的风气。影响所及，首先表现在缺乏充实、坚定的理论基础，而在史料的掌握上也不详尽、求实和严密。要更好地开展新世纪的北京史研究，必须转变这种不健康的学风，使它恢复到实事求是的路线上来。脚踏实地，刻苦钻研，并以严肃、严密、严格的作风不断要求自己。

三、改进方法。近年来，人们都在谈到史学方法应该改进，这既是史学本身的问题，也是时代潮流的要求。作为城市史、地区史、首都史的北京史研究工作，更有一个开创的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北京的历史，